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 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 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赵 峥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西康 彝族 乐西公路

对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海内外学界长期持有相对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① 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各有不同，但多以抗战时期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的相关论述及1942年蒋本人在西宁的讲话为论据，指出国民政府在战时不但延续而且强化了战前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同化”立场，宣称中国只有一个

* 本文初稿的主要内容曾于2013年在杭州举行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报告，得到与会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修改过程中，亦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沙青青助理研究员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① 赵学先等：《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187页；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rvard: Harvard East Asian, 1976), pp. 16—17; Thomas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7—28; 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42页；吴启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共民族识别政策的历史线索与政治面向》，余敏玲主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1945—200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0页。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台湾的“总统”均应加双引号。

“民族”即“中华民族”,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对于国民党民族政策的论述,主要建基于对战时国民党宣传文件的分析,忽视了对国民党具体政策及实际政治环境的考察。^①对于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除了政治话语的分析之外,更需要将政策文本放回具体的历史时空,探察政策实施的实际过程。

彝、苗等西南少数民族在整个民国时期被排除在汉、满、蒙、回、藏“五族”框架之外。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代表虽进行过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请愿活动,但因国民政府不愿改变“五族”的既定政治架构,未获得预定的成果。^②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据西南,比以往更重视边疆战略,为使自身势力进一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也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是否采取“同化”的方式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是否承认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差异和民族地位?国民政府、地方军人与边疆地方社会之间,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政治互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理解战时国民政府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有必要从这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即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的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档案、报刊、文集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等史料为基础,以国民政府在西康彝区的政治运作过程作为切入点,分析国民政府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实质,以期对既往认为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观点进行反思,增进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政治的整体认识。

一、“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乐西公路修筑的缘起与“彝务”议题的升温

“抗战发生,不久政府西迁。凉山夷区问题,随即亦渐受各方注意”。^③“凉山夷区问题”即“彝务问题”,亦即“夷务问题”。^④在当时的西康宁属地区,通常把处理“夷人”的事情称为“夷务”。^⑤清代中叶以来,由于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力量的发展和清朝统治的衰落,经过清朝册封的彝族“土司”等势力被逐渐排斥到边沿地区。黑彝贵族出于增加劳动力人手的需要,开始趁机组织外出劫掠其他民族的人口,成为造成该地区民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清末以来鸦片生产在凉山彝区的畸形发展,使得许多黑彝贵族获得各类生活用品、农具和枪支,力量更为膨胀。^⑥辛亥革命后,四川军人忙于省内政争,该地政府驻军减少,更有利于黑彝贵族势力的扩张,“造成20年来反叛大乱

^① 乔志健:《墨磊宁〈求同于国族: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程洪、张海惠主编:《当代海外中国研究二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② 对战前西南彝、苗少数民族代表的请愿活动及国民政府因应策略的研究,参见姜贵品《1937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第79—87页;杨思机:《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民族——抗战前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策略》,《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5页。

^③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重庆求真社1945年版,第124页。

^④ “夷”通“彝”。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彝族人民的意愿,决定以“彝”代替“夷”作为彝族的通称。《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彝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另有学者研究指出,“夷”虽属中国传统史籍对于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称谓,但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夷”已逐渐被西南地区后来被识别为彝族的许多支系认可和接受,成为他们在汉语语境中的自称,甚至有可能更精确地指代某些人群。参见温春来《“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VII页。本文出于尊重历史事实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原则,兼及行文方便的考虑,在正文中一概以“彝”代“夷”(如“夷务”、“夷人”、“夷族”和“夷区”,一律表述为“彝务”、“彝人”、“彝族”和“彝区”),引文中的“夷”则不做改动。

^⑤ “宁属”为西康东南部界于川、滇二省间之地域,辖有西昌、越嶲、冕宁、昭觉、宁南、会理、盐源和盐边八县,清代隶属四川宁远府,署设西昌。民初改称建昌道,后划为四川第十八行政区,1939年西康建省时划归西康。该地区“隶属虽迭有变更,然习惯上仍目之以宁属”。郑象铤:《宁属之地理环境及其区划》,《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年7月,第30页。

^⑥ 胡庆钧:《清初以来彝族奴隶制度的变化》,《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7页。

之局”。^① 1928年,刘文辉所部二十四军首次进驻宁属时,曾召集地方士绅召开“宁属行政会议”,通过一系列办理“夷务”的决议,但并无任何实际效果。^② 在这样的局势下,凉山地区的社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地方社会长期动荡。资源竞争的紧张态势使得汉彝之间处在持续的对立状态中,“夷人”也不免在“汉人”的观念和言说中被“妖魔化”和“污名化”,被许多汉人视为“野蛮民族”。^③ 据深入彝区考察的人类学家江应樑称,“‘畏威不怀德’,是边地汉人对凉山夷族的共同评语”,与彝胞交往,“只能施威,不能怀柔”。^④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曾昭抡也指出,宁属汉人称彝人“骄贪残疑”,“其风俗则贵欺诈,轻信义,以窃盗为能,不以懒惰为耻,不以杀人越货为不当”,“解决夷区问题,非大举兴兵平剿”。^⑤ 使用武力解决“夷务”成为许多汉族士绅和官吏的共识。但由于宁属彝区僻处西南,远离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彝务”问题长期仅为区域性的边缘议题,并没有引起统治重心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特别注意。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军政势力逐渐进入西南,以西昌为中心的宁属地区的战略价值逐渐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围堵红军长征时,中央军曾进入这一地区,有过具体了解。1935年5月,蒋介石曾乘坐飞机实地考察了西昌及其四周地理环境。^⑥ 1936年,地质学家常隆庆在“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之后,撰写并出版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断言“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冠。而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綰毂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⑦ 宁属资源的发现,对国民政府确定西南为抗战根据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在当年即指示铁道部长张嘉璈勘测四川通往云南的铁路路线,并称川南和宁属等地区“物产丰富,实为川滇之精华所在”。^⑧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居重庆,出于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决意加强对于西昌及宁属地区的控制和开发。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于月底撤销重庆行营,另在成都和西昌设置委员长行辕,由贺国光和张笃伦分任主任。^⑨ 西昌行辕成立不久,即任命常隆庆为行辕专员,具体负责宁属资源的开发工作。^⑩

由于西昌不仅是川、滇、康三省交界的要冲,而且是连接重庆、云南和印度的重要交通枢纽,国民政府遂有将其建设为重庆之外“第二陪都”的设想和行动。^⑪ 从1940年开始,在张笃伦的亲自主持下,西昌行辕开始在西昌邛海泸山一带为国民政府各部会及蒋介石本人秘密修筑办公和居住场所,定名为“行辕新村”。蒋对新村建设非常关注,特别指示建筑应为“疏散式”,“各种房舍不可筑

① 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② “宁属行政会议”的内容和经过,参见《宁属行政会议纪要》(1928年3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442/47。

③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1941年印行,第171页。

④ 江应樑:《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⑤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126—127页。

⑥ 赵乐群:《西昌——抗日战争的战略根据地》,《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7年编印,第16页。

⑦ 吴嘉陵:《常隆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234页。

⑧ 《蒋中正电张嘉璈四川通云南铁道最好由重庆沿金沙江西进务请先行测量及陈伯君拟在川教育厅留任》(1936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654A。

⑨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中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台北,四川文献月刊社1972年版,第65页。

⑩ 《张笃伦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关于常隆庆同意任昌辕专员一案的电》(1939年4月2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4/0005。

⑪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13页。

洋房大厦,只要如中国旧屋,不过多开窗户而已”,并嘱“速着手建筑为要”。^①由于前方战事不利,国民政府随时有再次迁都之虞,张笃伦一度决定“若此项房屋需用甚急时”,先暂将泸山庙宇进行修整以备使用。^②1941年年初,蒋甚至考虑安排各国大使来西昌避暑,故催促行辕加快新村住宅建设进度。^③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昌由边陲小城一跃而成为“后方军事,政治,与交通的重要中心”。滇越铁路中断后,由缅甸入境的货物多“采捷径直趋西昌”,“因此西昌地位,更形重要”,国民政府“对于西昌的经营,亦愈行积极”。^④据曾昭抡的观察,当时西昌城内公务员人数众多,“多半是外省来的人”。^⑤由于西昌及宁属战略地位的提升,1940年1月,蒋介石特别规定西昌行辕参谋由侍从室派任,每个月向他汇报一次西昌军政情况。^⑥

由于宁属地区在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由四川划入西康,故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势力亦与中央军政力量几乎同时进入西昌,两股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展开了全面的政治竞争。1939年4月,四川军人邓锡侯致电张群,密报刘文辉和刘存厚有“联名通电拥护吴佩孚”的企图,并指出“川康为中央肘腋”,“请以训练方式,在西昌驻劲旅以震慑川康滇边区”。^⑦国民政府设置行辕经营西昌,使刘文辉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争夺对宁属的控制权,1939年7月,西康省政当局在西昌设立“宁属屯垦委员会”,由刘本人自兼主任,派杜履谦为该会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同时并以刘所部二十四军的名义在西昌设立行营,以杨学端为参谋长。^⑧宁属屯委会和二十四军行营的设置,意在阻止中央军政机构直接对宁属地区发号施令,出现了边省军人与国民政府的对峙局面。尽管早在当年3月,西昌行辕就与西康省政府就划分权限问题达成协议,确定了“分工合作”的“六条原则”^⑨,但双方在宁属一直勾心斗角,龃龉不断。1940年2月,根据中统掌握的情报,刘文辉除通过龙云向美国购买军火外,还决意收编驻扎在西昌的中央补训处新兵四团,“并欲设法使西昌行辕迁出康境,以便与龙切取联络,免被监视”。^⑩

国民政府迁渝与西康建省使得宁属彝区“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学者专家、冒险家和奸宄之徒交相注目的一个区域”^⑪，“彝务”问题也随之急剧升温。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前后,也重新制定了治理彝区的政策。1939年4月,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后第一次“南巡”宁属,

① 《蒋中正电张笃伦西昌附近建筑式样及规定并速估计款项着手兴建》(1940年7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229A。

② 《张笃伦电蒋中正拟定行辕新村建筑大小房屋各项经费及如需急用拟就泸山庙宇修整备用等文电日报表》(1940年7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914A。

③ 《蒋中正电张笃伦西康设法增植十万人粮食及选十所新屋以备大使避暑》(1941年1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0917A。

④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13—14页。

⑤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7页。

⑥ 《蒋中正电张治中令西昌行辕每月详报西昌军政实情》(1940年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00000224A。1939年5月,中央在西昌设新兵补训处,蒋曾一度接受张笃伦的建议,委任自己的亲信、侍从参谋唐纵出任该处处长一职,以负责宁属征兵和练兵事宜,后因侍从室人事调整作罢。见《张笃伦电蒋中正拟于宁雅两属提前举办征兵并于西昌设新兵补训处即以唐纵调任处长等文电日报表》(1939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904A;传记文学杂志社编辑:《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39年5月10日、1939年5月12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⑦ 《邓锡侯电张群据潘文华及各将领皆表示服从委座并速决此次政潮及传刘文辉有通电拥吴之说》(1939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0973A。

⑧ 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7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⑨ 《张笃伦致张群信》(1939年3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08。

⑩ 《贺耀祖朱家骅等函蒋中正报告五十军全体官兵致刘湘夫人密电内容及川军将领谋恢复第七战区及潘文华部出川抗战目的等情报提要》(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920A。

⑪ 江应樑:《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第174页。

宣布“建设新西康的重心在宁属”，“建设宁属的重心在解决夷务问题”。^①为安抚部分反对划宁属入西康的地方士绅，刘文辉表示“改善治夷方法，根绝宁属夷患”为“南巡”的“最大任务之一”^②；另一方面，刘又致力于在政治上争取彝族家支^③，表示将“根本改革过去剿夷方法”。^④以西康省政府名义发布的《治理宁属边务方案》，第一条即规定“宁属边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应受国家法律上之平等待遇”，制定“三化”（“德化”、“同化”、“进化”）政策为新的政纲，并在“南巡”时提出四个口号：“不要见面礼”、“不收投诚费”、“汉夷平等”和“不准打冤家”。“三化政策”和四个口号宣布后，许多彝族家支纷纷向刘表示“投诚”，使西康省政当局逐渐在彝区“分区设治”。^⑤为在宁属与刘文辉进行政治竞争，西昌行辕亦非常重视彝务议题。张笃伦到西昌就职后，“深觉解决夷务实为开发之先决条件”。截至1939年5月初，他已经接见来自“百数十支”的彝族家支代表，“每次数十百人”。在与这些人会晤之后，张“深觉彼辈见解并不浅陋，旧日方式决不足以解决问题”，“培植夷族青年方法实关重要”。^⑥乐山通往西昌公路（简称“乐西公路”）的修筑，则为国民政府介入宁属彝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早在1935年围堵红军入川时，蒋介石就有过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的构想。1937年宁属资源发现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将乐西公路列入公路建设计划，次年的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再次确认乐西公路作为战时交通建设的重要项目。^⑦西昌行辕成立伊始，即着手开展西康省境内的公路勘测工作。1939年4月，张笃伦向蒋介石报告乐西公路勘测情况时即提出，乐西路沿线“人烟稀少，经过长距离之夷地”，“非运用夷力，恐无办法”，建议组织“夷工筑路队”，“用军事管理”，“并可乘机施以政治训练”。^⑧1939年8月，乐西公路在西昌宣告开工，正式揭开建设序幕。^⑨乐西公路的修筑，意在加强重庆方面与宁属之间的交通联系，既是抗战整体战略的需要，也夹杂着国民政府和边省军人之间的权争。国民政府退据西南，不仅使得原本处于边疆的彝族在地理上更接近中枢，而且使区域性的宁属彝务问题升级为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议题。在新的政治情势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距离得到前所未有的拉近，并随着乐西公路的修筑进程产生更多的互动。

二、筑路动员机制与边疆“代理人”

西昌行辕在乐西公路开工前后，已充分意识到利用筑路与宁属彝族发生政治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如何动员语言不通、对抗战意义不甚明了的彝民参加筑路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和政治训练，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与宁属地方势力的互动过程中，行辕

① 《欢迎劳苦功高的刘主席》，《西康国民日报》，1939年12月4日，第1版。

② 《建设新西康与新宁属政府人民应互信共信——刘主席在西昌各界欢迎会讲演（续）》，《西康国民日报》，1939年12月7日，第2版。

③ 凉山彝族以“家支”作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家支”制度的介绍，参见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53页。

④ 《夷务会议昨举行刘张发表治夷策略》，《宁远报》，1939年8月26日，第3版。

⑤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12页。

⑥ 《张笃伦电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年5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24。

⑦ 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5页。

⑧ 《张笃伦电蒋中正踏勘西昌机场及川滇西路嘉西段并拟委托羊仁安邓秀廷组夷工筑路》（1939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904A。

⑨ 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第56页。

开始运用两种边疆“代理人”作为沟通和联系宁属彝民的纽带,建立起一套较为有效的筑路动员机制。

1939年3月,张笃伦在赴西昌履新的途中停靠富林,住居此地的宁属豪强人物羊仁安“殷恳留住,并召集远近夷族头人前来听训”。在羊的协助下,彝族头人们聆听了张的训话,后一同欢宴饮酒,“均愿帮助修路”。羊仁安的主动输诚,使张笃伦意识到利用羊等地方上层人物动员彝民的重要性。张随即致电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称羊“在建南一带声威久著,汉夷钦服,对职极表好感,竭诚相助”,并打算任命其为“行辕中将参议”,“请其召集夷人万余编组路工队”。^①重庆方面很快复电表示赞成对羊的任命^②,交通部亦依照要求派出官员赴宁属商谈编组彝民筑路队的具体办法^③,将组织彝工筑路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张笃伦抵昌就职后,掌握宁属地方武装的军人、“靖边司令”邓秀廷亦积极配合其工作,“迭次率领”许多彝族家支代表到行辕晋见^④,很快成为张处理宁属彝务问题时极为仰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邓手握武装,经营宁属多年,加之其反对划宁属入西康,与刘文辉素有嫌隙,更为国民政府所看重。^⑤张笃伦在发给张群的密电中强调,“羊仁安、邓秀廷两员在此间具有特殊力量,诚恳效命”,早在1935年薛岳率领中央军追击红军经过宁属时,就“曾委以中将阶级之名义”,“故欲得其心而使尽其力”。^⑥1939年7月,侍从室在向蒋介石汇报西昌近况时也指出,邓秀廷“在宁治夷垂十余年,颇得人心,可号召夷兵十万左右,有蛮王之称”,其反对划宁归康,虽经刘文辉在形式上收编,“但仍同床异梦,双方存有畏视鲸吞之心理”,故邓“亟欲归附中央,苦无援引”,“如中央能将邓氏收隶,则将来边陲可减去一部隐忧”。^⑦由于邓秀廷和羊仁安均表示全力支持乐西公路建设,行辕决定任命二人担任“督工司令”,“分任南北两段,各召夷工万余人,编组筑路队”。^⑧

尽管有羊、邓这样“在此间具有特殊力量”的地方头面人物愿意充当国民政府动员彝民的“代理人”角色,初步解决了招募彝工的问题,而对这些不通汉语、不懂技术的彝工进行宣传、组织和训练,则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培养的彝族干部负责完成。1936年,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在举办屯垦训练班时,曾在四川雷马屏峨彝区招收了一些彝族学员。^⑨在考虑编组彝民筑路队之时,张笃伦即想到包括这批学员在内的屯垦班“宁属汉夷学生百余人”,毕业后“散无职业”,再加上中央军校几个月前毕业的几十个彝族学生,此时可加以使用,“委以管理民工、夷工及深入夷地宣传组织之工作”。^⑩而国民党内最早的几个彝族干部,特别是曲木藏尧和岭光电,此时更被委以重任。曲木出身于越西白彝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彝汉语均很流利,为中央政治学校第一个彝族学生,毕业后曾被国民

① 《张笃伦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1939年3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89。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电西昌行辕、函交通部》(1939年3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89。

③ 《交通部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关于派员会商召集夷人筑路办法一案的公函》(1939年4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89。

④ 《张笃伦电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年5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24。

⑤ 1938年,国民政府、四川军人和刘文辉之间达成妥协,准备将宁属地区由四川划入即将成立的西康省,引起邓秀廷的极大不满。为抵制刘文辉势力的进入,邓甚至预谋武装阻击二十四军入宁,后因政治风险过大作罢。参见岭光电《我所知道的羊仁安与邓秀廷的关系》,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85页。

⑥ 《张笃伦电张群》(1939年4月1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09。

⑦ 《陈布雷、张治中呈邓秀廷治夷颇得人心与刘文辉同床异梦欲归附中央之情报提要》(1939年7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919A。

⑧ 《张笃伦电张群》(1939年4月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09。“南北两段”各有范围,南段从擦罗以南至西昌,北段从寿屏山至富林。参见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第107页。

⑨ 《成都中央军校分校办屯垦训练班》,《四川月报》,1936年8月,第162页。

⑩ 《张笃伦电张群》(1939年3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07。

党中央派任党务特派员回西南从事宣传工作,在京期间亦曾积极参加为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争取地位的活动,在彝民中具有很高声望。^①岭光电则出身于越嵩(今属四川甘洛县)黑彝土司家庭,5岁时丧父,13岁时遭受四川军人刘济南“改土归流(刘)”,母亲遇害,后得羊仁安保护和资助,成为中央军校第一个彝族学生,亦曾与曲木一道参加为彝、苗民族争取权利的运动,毕业后被派回西南工作,协助中央对彝区的考察,并负责招收彝族青年入中央军校就读,1937年返乡后受到当地彝民拥戴,恢复土司职务。^②边民筑路队组建之后,行辕派曲木藏尧和岭光电分赴邓秀廷和羊仁安帐下,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其中邓秀廷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南段督修司令部”征调彝民5000人,分成四个支队,曲木出任其中一个支队的支队长;羊仁安任司令的“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督修司令部”则动员1200多彝胞参加筑路,岭光电则担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的支队长。^③曲木与岭氏一为“白彝”出身^④,一为破落土司,皆非在当地拥有很大权势的上层人物。但二人受训于国民党中央军政系统,通过参与西南彝、苗民族请愿运动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声望,在新的时代气氛和权力格局下找到了自身的政治上升空间。作为兼具“中央”与“边疆”身份的“新精英”,他们一方面凭借自身的“彝族”身份充当国民政府在彝区的“代理人”,同时也借助“中央”官员的名号建立自身在彝区的权威。

为培养更多的彝族干部,行辕开办“边民筑路干部训练班”,将前述中央军校的彝族学生,外加在彝区挑选的“夷人优秀青年”,编成学员、学生两队,分军事、政治、筑路三方面进行训练。^⑤岭光电按照张笃伦的指令,写信或派员将过去由自己保送受训的青年招来,南段方面的学员亦由邓秀廷选送至西昌。学员在西昌白塔寺集中受训,曲木藏尧和岭光电分别担任筑路班的大队长和教官。^⑥该班定名为“委员长西昌行辕筑路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筑干班),于1939年6月开班,8月结束,共历时三个月。学员人数共90名,其中曾于军校受训者26人,懂汉文者42人。训练时间原定一个月,后因学员基础过差,延长为三个月,“重术科与筑路实习”。除曲木和岭氏二人外,靖边司令邓秀廷、副司令孙子汶以及曲木之兄王济民(曲木倡民)亦来筑干班任教,为学员亲自授课。^⑦张笃伦也曾来筑干班讲话,由岭光电担任翻译。张在讲话中表示,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汉族,只是生活环境和所受教育较差,以此勉励学员。^⑧曲木藏尧在筑干班结束前夕也撰文称,筑干班的学员和学生“所要干的”是“和万里长城一样伟大的工作‘乐西公路的修筑’”,他们虽然“是边民,是文化落后的同胞”,但“他们有聪敏而纯洁的脑筋,强壮而能吃苦耐劳的身体,无党无派,心境坦荡,如白纸一般,真是一个个天真烂漫,活泼泼的可爱极了”,所以筑干班“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每日除数小时注入式的教育外,我们随时随地利用着种种的机会,来启发他们,来兴奋他们,使他们自然振作,每个人都感觉到受教育”。^⑨尽管如此,筑干班的学习生活仍然相当辛苦,学员在上课下操之外还需

① 对曲木藏尧生平的简介,参见王大成(曲木达成)、王大伦(曲木达伦)、王大大(曲木达文)《凉山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曲木藏尧》,《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59—363页。

② 对岭光电生平的简要介绍,参见尔布什哈《岭光电简明年谱》,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1—4页。

③ 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92页。

④ 在凉山彝族社会中,“黑彝”为统治者,“白彝”为被统治者。辛亥革命后,部分“白彝”发起反抗“黑彝”的“改汉运动”,曲木藏尧的父亲即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黑彝”和“白彝”的来历和相互关系,参见刘尧汉《从凉山彝族的系谱看它的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49页。

⑤ 《张笃伦电蒋中正呈报调集夷民筑路并先已编队训练干部情形日电日报表》(1939年8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1905A。

⑥ 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94页。

⑦ 岭光电:《保情述论》,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44页。

⑧ 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94页。

⑨ 曲木藏尧:《筑干班的教育》,《宁远报》,1939年8月18日,第4版。

要实习修筑,不准偷懒。^①在学习和实习之外,筑干班还组织“同乐会”,演出“抗战歌剧等节目”,“最后夷族学员唱当兵好领袖歌,音声嘹亮整齐”,“可见该班训练夷人成绩之一般”。^②筑干班的举办,为组织彝民筑路准备了必要的干部基础,也进一步增强了曲木和岭光电在彝区的影响力。据岭氏回忆,随同他返回北段筑路队工作的30多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均不断在工作中,先后完成数十万土石方”,“其待遇虽低,不足月之火食费,衣服亦不能购置”,但在岭氏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下,加之以为国建设、为彝族争面子等口号的鼓动下,“全无怨言”地参与了全程筑路工作。^③

对于普通彝工的训练,因其规模和成本的问题,其进行过程则远不如干部训练顺利。尽管邓秀廷、羊仁安亲自负责征工工作,但因组织协调上的问题,征召人数远未达到行辕的预期,甚至连邓、羊二人都因征工区域问题发生争议。^④交通当局以“达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治经济一律平等的地位”来号召彝民参与筑路^⑤,可是征工的实际运作上仍需要黑彝家支的合作,并满足其相当利益。^⑥最后参与施工的彝胞人数并未达到张笃伦所期待的“万人”^⑦,远少于参与修筑其他路段的汉族民工。^⑧对于彝族工人的训练,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位负责彝工训练的工作人员表示,“夷工训练,难于汉工,以其语言之不同,生活习惯之异趣,与乎知识水准之低下,种种差别所致也”,为保证训练成效,必须“操习夷语”、“明了夷情”,“不可操之过急”,并采取“汉夷工混合编组”的方式。^⑨尽管彝工训练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颇为棘手,“汉夷工混合编组”的方案也仅止于纸面,但西昌行辕仍设法对彝工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扩大自身政治影响。行辕政治部在筑路工程开始后,派出“政治队员”前往包括彝民筑路队在内的各处工地,“对汉夷民工,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期以唤醒民工,增强工作效率”。^⑩邓秀廷领导下的南段督修司令部,在各彝工大队均举行升降国旗仪式,间有“政治特派员”和“地方知识分子”到场“讲演汉夷合作与筑路要政及升降国旗意义”,由担任各中队长的彝族干部翻译,向彝工宣传。^⑪

行辕借筑路之机培训彝族干部的举动,使西康省政当局亦感受到加强对彝族工作的紧迫性。1940年1月,宁属屯委会在西昌开办“边民训练所”,也开始进行彝族干部培训。屯委会在对外宣传中,非常肯定“边民训练所”的作用,称“学员代替我们解除很多的困难,免去了用解决民族问题非流血不可的方法”,“宁属现在有六十万的夷胞,和屯委会打成一片了。”^⑫为解决边训所的师资问题,屯委会亦聘请岭光电等人和中央军校彝族毕业生前来主持授课。^⑬边训所毕业学员,派回担任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职,优秀者则由屯委会留用。屯委会更表示,“无论中央或地方所办边民训

① 岭光电:《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94页。

② 《筑训班昨开同乐会夷人歌声整齐》,《宁远报》,1939年8月14日,第3版。

③ 岭光电:《保情述论》,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46页。

④ 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第109页。

⑤ 《交通当局印发告筑路民工书》,《西康国民日报》,1939年11月17日,第2版。

⑥ 俄国人顾彼得(Pote Gullart)在游历彝区时发现,黑彝王克明招募白彝筑路,以换取钱和步枪。参见顾彼得著,和铸宇译《彝人首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⑦ 曾昭抡认为,所征彝工总数再加上邓秀廷所部的彝族部队人数“还到不了一万”,“最后实际工作的五万民工当中,夷人不过占去两千”。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39页。

⑧ 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第54页。

⑨ 刘文:《夷工训练之我见》,《宁远报》,1939年12月1日,第2版。

⑩ 《行辕政治部工作队训练汉夷民工》,《宁远报》,1939年8月12日,第3版。

⑪ 《提高民族意识各地举行国旗升降礼泸沽夷胞并自动参加》,《宁远报》,1940年1月10日,第2版。

⑫ 王长礼:《访问边民训练所》,《新康报》,1941年11月5日,第3版。

⑬ 岭光电:《保情述论》,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44页。

练学校毕业之夷族学员,本会尽量设法录用使其上进”。^①

在乐西公路的修筑过程中,西昌行辕充分利用组织“边民筑路队”的机会,将中央的政治影响成功地扩大到彝区。在这个过程中,行辕一方面拉拢羊仁安、邓秀廷等宁属实力人物,充分利用其在彝区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则借机培养和训练彝族干部,通过筑路的动员过程,将自己的“代理人”嵌入宁属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当中。

三、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对于彝工筑路的宣传

乐西公路通车之后,国民政府利用其宣传机器,极力宣传彝胞对于筑路和抗战的贡献,突出“中央政府”对于彝族的“爱护”以及彝族对于“中央政府”的“拥护”。围绕彝工筑路的各方互动,不仅没有随着筑路结束而终止,而且不断被注入更多的政治内涵。

1941年2月,乐西公路试通车。与此同时,为“迁都”预备的西昌“新村”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3月,蒋介石即决定派遣国民政府各部会的代表前往西昌,以“乐西公路旅行团”的名义验收新村工程,并了解沿线的各种情况。^②该团最后定名为“行政院康昌旅行团”,由国府各部会、国民参政员和部分文化经济团体代表组成,于6月底从重庆出发。^③尽管康昌旅行团主要任务为验收西昌的新村工程,并考察乐西公路的建设情况,但对彝务问题也非常关注,称“此数百万之夷民,善用之则为抗战建国之福,不善用之则为后方治安之祸”,“政府不能长听夷区沦为化外”,故旅行团“沿途所经,如擦罗、铁寨寨、拖乌、大桥以及西昌北山一带,凡有夷人住息之地,乃深入考察,召集夷民,论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大义,晓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真谛;并访问各黑夷领袖,垂询夷民详情”。^④康昌旅行团遂成为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与西康彝族发生进一步政治联系、借机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纽带。

7月,旅行团抵达富林后,岭光电即“召集筑路夷民三百余人,并亲率其部属二百人,跋涉一百二十里之长途,自大渡河彼岸之田坝来会”,旅行团遂借机在富林小学为这500多名彝胞召开“边民大会”。^⑤在羊仁安致词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王志远代表旅行团向彝胞发表演说,由岭光电负责译为彝语。王志远在演说中以生动的语言鼓吹“汉彝平等”,并宣传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权威地位。另有旅行团团员发言,希望彝胞“以后要努力参加筑路这类的工作”。^⑥旅行团最后宣布奖励筑路彝工法币1000元,赠酒一大坛,“夷民欢跃,尽欢而散”。边民大会“意满深长,兴奋而热烈”,旅行团团员朱契撰文称:“此五百夷民归至深山,将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使知中央虽在抗战建国外端并进之秋,仍未忘边民同胞,则其影响于将来,岂浅鲜哉?”^⑦代表中央的康昌旅行团经过彝区,亦使部分彝族精英意识到潜在的政治机会。考察团经过大桥时,“罗洪支百余人武装来谒,告以老五支不法杀人起货情事”,并宣称“只为主持正义”,请求国民政府介入彝

① 《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成立两年来治理边务概况(续)》,《新康报》,1941年12月18日,第3版。

② 《蒋中正令贺耀组陈布雷发起乐西公路旅行团与张群等会商组织及出发日》(1941年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917A;傅惠和:《西昌新村特区修建经过》,《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研究会1996年编印,第196—197页。

③ 《行政院康昌考察团筹备就绪定期出发》,《宁远报》,1941年6月25日,第2版。

④ 朱契:《康昌考察记》,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⑤ 朱契:《康昌考察记》,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第39页。

⑥ 流沙:《西路游踪:乐西路巡礼(续)》,《宁远报》,1941年8月24日,第2版。

⑦ 朱契:《康昌考察记》,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第39页。

族家支的内部纠纷。^① 国民政府也试图通过旅行团进入彝区视察一事,宣示“中央”在彝胞中的权威。一篇被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检扣后又转作为“党政军关系方面之参考”使用的稿件称,彝胞“已经知道有而且很信仰中央政府”,“旅行团的卡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成千的夷人从几百里路以外赶来,欢呼着瞻仰中央派来的汽车。看见飞机,他们便叫做神鸟,不用说神鸟也是中央派来的”,“虽然这些模模糊糊的概念,还只能算一点最低度的政治的醒觉,但究竟有了这一点醒觉,在夷区中对于国家制度文物的介绍和宣传上增加了多少的便利,也许就凭一点点醒觉,我们要来解决一个两千年不能解决的问题”。^② 1941年8月,康昌旅行团抵达西昌,参加川滇西路(乐西公路与西祥公路)的通车典礼,使得“彝务”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西昌行辕主办的《宁远报》借欢迎旅行团一事发表社评,表示“解决夷务,实为开发宁属之先决条件。同时我们深知边民刻苦勤俭,崇尚武力,富有民族意识,今后如何使此种边民武力成为国家武力的一部,更值得我们重视”。^③

乐西公路通车前后,国民政府公开肯定彝工在乐西公路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宣传“中央”与彝胞之间的紧密联系。1941年7月18日,西昌行辕和宁属屯委会联合组织了慰劳汉彝民工大会,彝工代表和汉工代表一同接受了奖旗,军委会政治部新闻影片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将颁奖仪式摄入影片。^④ 1942年春,国民政府再次拨发乐西公路民工奖金时,分别奖励南、北两段彝工筑路队各5万元,这一金额在同时获奖的西康九县中可排到第4位。^⑤ 1942年7月,张笃伦在抗战爆发5周年纪念日的广播讲演中,表示宁属彝胞“对于中央的信仰,国策的认识,及对最高领袖的诚恳服从的情态,尤令人感动和兴奋”,蒋介石已被他们认为“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救星,尤其是夷民的救星,尊之为高天,呼之为太阳”,也正是由于1935年后中央军政势力进入彝区,以“和爱的态度”对待彝胞,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感召”,所以彝胞近年来“参加各项工役,踊跃做工,已经有数万人之多”。^⑥

在宣传彝工筑路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创造出一套不同于既往地方汉人士绅将彝胞“污名化”的论述,而是努力呈现其正面、积极的民族形象。曾参与筑路工作、具有军统背景、后担任宁属宁南县三青团负责人的黄万民撰文称,他“亲眼看到一般的白夷,肩负着相当重的货物,虽悬崖绝壁爬山越岭仍如履平地,日行百余里”,彝胞能“克服痛苦,惊惨,疾病,流血,气候,此为吾汉族所不及,尤其为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所不及”,彝族“刻苦耐劳的性能,的确超过其他的民族,是如何的值得我们钦佩啊”。^⑦ 筑路过程中亦不只有对彝胞“刻苦耐劳”品质的“发现”,还有对于彝族艺术与文化的肯定与褒扬。1939年8月23日,行辕筑干班的彝族学员在毕业典礼后表演文艺节目,获得很高评价。^⑧ 《宁远报》在次日的一篇评论中,对彝族学员演出的“边民戏剧”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彝胞“头上的布角”、“体格”和“五官”,再“配以色彩鲜明的服装,那真算最高的东方艺术,可在巴黎赛会中比美了”。^⑨ 筑路过程中,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带队经过公路沿线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最终制作完成的片子中有约12分钟镜头反映了彝工修筑乐西公路的情况,将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团

① 朱契:《康昌考察记》,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第123页。

②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印:《夷务专辑》(1942年5月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510/28。

③ 《欢迎康昌旅行团》,《宁远报》,1941年8月6日,第1版。

④ 《西昌盛会慰劳汉彝民工》,《中央日报》,1940年7月26日,第2版。

⑤ 《奖励康省修筑乐西路民工中央再拨奖金廿万元》,《宁远报》,1942年3月28日,第2版。

⑥ 《行辕张主任讲西南边区的概况抗战五周年纪念广播演词》,《宁远报》,1942年7月9日,第1版。

⑦ 黄万民:《从保罗的民族性谈到心理建设(续)》,《新康报》,1941年10月17日,第3版。

⑧ 《筑干班屯训所昨联合举行毕业开学典礼》,《宁远报》,1939年8月24日,第3版。

⑨ 于飞:《筑干班毕业会中的边民戏曲》,《宁远报》,1939年8月24日,第4版。

结抗战中的一员呈现在银幕中。^① 1944年,川滇西路管理局将彝族服饰、用具与经典各借用一部,送到重庆参加“全国各交通机关工作及沿各路线文物展览会”。^② 公路展览会举行过程中,交通当局还组织了“边疆筑路及全民筑路座谈会”,特别总结了“边民筑路”的经验。^③

在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筑路和肯定彝族地位的同时,西康省政当局也采取类似的宣传口径。宁属屯委会主办的《新康报》在报道中称,乐西路筑路彝工“工作效率甚高,工作亦极努力”,“边民爱国热忱,亦不后于汉民”。^④ 但明显不同的是,西康省方面更突出刘文辉在动员彝胞方面的作用,鼓吹边省当局在彝区的影响力。1944年4月,刘文辉委任的宁属屯委会副主任委员李万华宣称,包括乐西公路在内的各项工程,能够使“自古以来”都“未参加工役”的“边民同胞”能做到“莫不遵从命令,相率工作”,是西康省政府“经边卓卓的效果”。^⑤ 同年,刘文辉亦在建省后第二次“南巡”宁属的过程中,强调彝胞正是在他实施“三化”政策之后,才受到“感召”,“因此在修筑乐西公路与西祥公路的时候,我命令各县,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夷工,从事于艰苦的修路工作,并没有怠工犯规的事情发生”。^⑥

在这样的宣传基调下,“彝族”非但一洗既往汉人士绅言说中所谓“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的负面色彩,而是以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民族抗战中,其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其民族形象被重新审视、认知和塑造,反过来又推动了对于既往治理彝区模式的反思。1941年7月,羊仁安以“乐西路督修司令”的身份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特别强调“治夷应施用政治教育力量”,进而赞扬“曾毕业中央军校”、“颇为夷民所爱戴”的“义子”岭光电。^⑦ 由于对动员彝工筑路作用巨大,兼具“政府官员”和“彝族土司”双重身份的岭光电开始在宁属的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宁远报》对岭光电进行专访,称岭氏“站在夷族同胞的立场上,研究目前的夷务问题,改进一切夷胞的习惯与纠纷,使一群文化落后的夷族同胞,走进政府的法令范围内,不打冤家,不种烟,不抢汉人,并且曾率领了将近两千夷工,修筑乐西路,完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一般夷胞非常尊敬他信仰他”。^⑧ 康昌旅行团团员、中央大学教授朱契在对岭光电的专访中,亦称岭氏为彝族中“不得多得之领袖人才”,“中央方今勤于远略,开发边疆”,彝族又“居后方国际交通线之冲”,“则对于边民中之领袖如岭光电者,当知所以因势利导,而善用之”。^⑨ 这些报道和评论,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彝族政策的变化,从而为战后彝族精英继续争取民族地位和民族权利创造了必要的舆论环境。

结 语

国民政府组织西康宁属彝民修筑乐西公路的个案表明,国民政府在战时对待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已经不同于战前处理彝、苗民族代表请愿运动的态度,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调整。抗

^① 刘忠福主编:《乐西公路》,第107页。郑君里在回顾《民族万岁》的拍摄过程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整部纪录片的中心主题。参见郑君里《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② 《乐西路沿线风物管理局搜集送渝展览》,《新康报》,1944年1月25日,第4版。

^③ 《公路展览会举行边疆筑路座谈》,《西康国民日报》,1944年4月8日,第1版。

^④ 《边胞五百参加建设工程》,《新康报》,1941年9月3日,第3版。

^⑤ 李万华:《官民通力合作,完成新宁属建设》,《新康报》,1944年4月21日,第4版。

^⑥ 《川滇西路管理局欢迎会上刘主席讲词全文》,《新康报》,1944年12月24日,第1版。

^⑦ 《羊仁安氏对中央社记者畅谈宁属夷务问题主张施用政治教育力量》,《宁远报》,1941年7月30日,第2版。

^⑧ 昆厚:《土司岭光电谈夷务问题》,《宁远报》,1941年12月12日,第2版。

^⑨ 朱契:《康昌考察记》,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12卷,第131页。

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较之于战前更为重视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问题,由高层政治人物直接涉入政策研究。^① 1941年,行政院更明令宣布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对少数民族含有侮辱性质的命名,以示尊重。^② 尽管国民政府存在确立“中华民族”(“国族”)为中国唯一“民族”的政策导向,但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其他族群的“民族”地位,更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同化”政策,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灵活地选择自身的策略。为加强对宁属彝区的渗透和控制,国民政府任用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等既代表西南少数民族发声、同时又与国民党中央军政系统有着较深渊源的政治人物作为自身“代理人”,利用其“在地”的优势和军政才干,对彝胞进行组织和动员,在彝区建立自身的权力基础。国民政府与这些新式“地方精英”形成的共谋关系,以及“党国”宣传机器对于“彝族”的正面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些“五族”之外群体的政治承认。与国民政府同期进入宁属彝区的刘文辉,也出于因应时势的需要,调整了对彝区的治理策略,在西康省省政框架内承认“彝族”与汉、藏两民族平等的地位,以争取彝族上层对于其施政的合作。^③ 其与国民政府在战时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也为岭光电等兼具多重政治身份的彝区“新精英”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④ 岭氏等人权势和影响力的增强,也为战后西南少数民族的请愿运动埋下伏笔。各方互动的结果,虽未更动民国以降的“五族”架构,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彝族”在国内民族政治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虽有重要的转变,但其看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深层次思想观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其治理模式仍不脱传统“剿抚”和“教化”策略的窠臼,未能使民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⑤ 国民政府始终缺乏清晰、系统和明确的边疆民族政策,其政策取向并非一以贯之,政策运行更是漏洞百出,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⑥

[作者赵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送于右任等三委员关于研究苗苗等族问题一案的笺函》(1938年12月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5.3/103.13。

② 《行政院明令规定对边疆同胞之称谓应以地域区分称为某地人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名称》,《宁远报》,1941年8月24日,第2版。

③ 参见刘文辉《西康疆域之调整与民族之联系》,《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康导月刊社1943年编印,第49页。

④ 1940年,因在动员彝工筑路中作用突出,曲木藏尧在彝区的权势日渐增强,与邓秀廷之间矛盾激化,最终为邓所暗害,亦显示出此类人物所处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参见杨尚忠《曲木藏尧之死》,《越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越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92—94页。

⑤ 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西昌战役和领导开辟凉山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梁文英回忆,抗战后西昌行辕曾对普雄彝族采取军事行动,恶化了宁属地区的民族关系。解放军进入宁属后,曾遭受过彝人的袭击,汉人则向其“诉彝族的苦”,地方士绅则称解放军“整治不了彝民,保护不了汉人的利益”。参见梁文英《春到凉山与风雪边疆——川滇民族工作回忆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⑥ 例如对于彝族干部受训后的工作安置问题,行辕并未办理妥善,相当一部分彝族干部没有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参见岭光电《保情述论》,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45页。